

痛快地放弃了非西欧模式，因此，它同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一样，也陷入了深受“东方主义”束缚的无主体性状态。

[VII]

“情念国家”的形成与克理斯玛： 中日两国的相似性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战前和战争时期的日本有两个惊人相似的地方。第一是对于“胜利”的确信，国家领导人和国家意识形态认为一定能够赶上和超过欧美现代模式，并且这种模式必然能够造就东方的“现代”（因此也就是“超现代”）；第二，重视增强国家的物质力量，同时又把这种物质力量单纯地当作远比西方科学技术的物质力量优越的“国家性情念”的力量，并对此更加看重。特别就第二点来说，可以认为，国家性情念的力量来源于通过对“一君万民”性的克理斯玛崇拜而喷发出的民众的激情和愿望。

我在这里把以民众的激情和愿望为动力，试图让民众和“活着的神”（超克理斯玛）直接结合的国家称为宗教化的“情念国家”。³⁵借用鹤见俊辅的说法，在战争时期的日本，通过对天皇的绝对崇拜而形成的国家宗教化，使得构成日本“国体”的显教和密教中的密教因素迅速膨胀。³⁶当然，农民、渔民的“情念”虽然依然带有非政治性，但只要被纳入到“国体”中去，其意识就会逐渐脱离生命循环的时间周期而不可避免地游离于所生活的土地或大海。

在以克理斯玛为顶点的专制国家，民众和克理斯玛之间通常存在着金字塔型的国家官僚机构。希特勒也好，斯大林也好，古今东西的所有专制体制几乎都存在着强大的官僚机构。³⁷与此相较，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时期的中国，神灵一般的克理斯玛毛泽东将他自己也参加创建的党和行政体系中的金字塔型官僚机构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官僚阶级”组织而彻底打破，缔造了一个

将自己和崇拜自己的民众直接结合的情念国家。但正如1980年王小强当作“农业社会主义”而加以批判³⁸的那样，从追求以民众的情念为动力来推进社会变革这一点来看，毛泽东所向往的“情念国家”带有浓厚的农本主义特征。

与之相同，在日本，自吉田松阴提倡建立“一君万民”³⁹的集权体制，到农本法西斯主义，其间发生了从昭和初期的血盟团事件、神兵队事件、五·一五事件到二·二六事件等一系列少数“志士”发动的恐怖事件，存在着促进情念国家形成的社会土壤。但日本与中国的区别在于，情念国家在中国是由克理斯玛毛泽东主动与民众直接结合而缔造的，在日本则是由具有农本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所谓“皇道派”青年将校推动的，并不是克理斯玛天皇自身所希望的。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生活在等身大的非政治世界的农民被纳入国家政治的过程，大多与上述“一君万民”的农本主义情念国家中的“密教”性装置有关。但是在情念国家形成的时候，往往可以看到，介于民众和克理斯玛之间的国家官僚机构在吸取了民众对克理斯玛的激情信仰之后，也将自身变成了克理斯玛，形成党派集权专制。日本法西斯主义以所谓“统制派”为中心的部分军部官僚就是很好的例子。对此，吉本隆明称之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以示与农本法西斯主义的区别。他认为，日本法西斯主义就是在两者的“对立和勾结”过程中产生的。⁴⁰

与日本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统制派”类似的国家官僚机构专制，在革命过程中的以及60年代前期的中国，也以共产党组织专制的形式出现了。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力图打破这种官僚机构的统治。

但无论哪种形式，情念国家的基础都是民众在面临战乱和自然灾害带来的贫困、破产和对日常生活的破坏时寻求救助和加以抵抗的强烈愿望。当然，这种愿望并不能直接联系到“一君万民”性的或毛泽东崇拜之类的克理斯玛崇拜。例如，石牟礼道子在《苦海净土》和《椿海记》⁴¹等作品中所描绘的

同水侯病抗争的渔民们,虽然也充满了抵抗的情念,但并没有出现集渔民的崇拜于一身的克理斯玛。石牟礼写到:

“患者们去参加氮肥公司股东大会的时候,可就一下子登上了舞台……。生出上了豪华舞台的感觉。因此一下子就不知所措了……。下层民众的情念这种东西,如果不是被连根撕裂开来,就无从看到这般豪华热闹的世界,尽管只有那么一瞬……。由于极度悲伤,学生们也颤抖着默默流泪。”⁴²

在水侯渔民的抗争运动中,之所以没有出现克理斯玛之类的人物,原因在于渔民自身是直接抗争主体,几乎不存在党派或知识精英作为运动的领导者、鼓动者而介入的情况。虽然党派和知识精英们作为支援者确实存在,而且也确实起到了把运动推向全国的作用,不过,位于运动中心的通常是作为常民的当地渔民。因此,只要常民的斗争源于抵抗的情念,也就会出现对于国家政治的“抵抗政治”,将其纳入国家政治从而建立“情念国家”的图谋就难起作用。

当然,像明治时代“足尾矿毒事件”⁴³中的田中正造那样,兼具知识精英和政治家的双重角色而成为运动领导者的例子也是有的,但最终决定运动演进的,依然是渡良瀨川流域的农民所具有的抵抗国家政治的情念,田中正造并没有成为克理斯玛型的人物。这当然也与他自身存在的一种内在对立意识有关,同竹内好和石牟礼相似,他在保持着等身大的自我意识的同时,立意面向政治世界发起行动。

类似情况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村落共同体重建运动中也可以看到。在1940-1943年间的保卫民众日常生活的上述运动中,针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尚未建立。⁴⁴毛明显地成为克理斯玛是在村落重建运动告一段落的1943年夏天。当然,由于党内存在着毛泽东与留苏派王明之间的激烈权力斗争,中国共产党在运动期间就已经为针对毛的个人崇拜埋下了伏笔。上述权力斗争虽然也包含着根据地建设方面的对立(路线斗争),但村落重建运动的主要力量边区农民并没有参与这种斗争,而是完全置身于路线斗争的权力政治之外。

中共内部确立针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努力,始于毛取得了胜利的1943年7月前后,也就是村落重建运动化解了陕甘宁边区的存亡危机之后。这种人为的努力自然与当时的政治判断有关,也即国民党已经拥有为全国所熟知的蒋介石这一克理斯玛,而共产党则缺少与其匹敌的人物,这一缺憾不利于同国民党的对决。为此,在共产党迎来建党22周年的1943年7月,刘少奇(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以“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为题的讲话中指出,“在22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需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环节和部门中去。”⁴⁵

但需要注意的是,刘少奇本人未必希望成为克理斯玛的毛泽东与人民大众直接结合,不过是主张通过以钢铁般的团结自豪的党的组织来贯彻毛的领导。换言之,确立毛的权威只是确保实现党的绝对领导权威的手段。刘将这种想法称之为“布尔什维主义”。如果与战争时期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加以比较,可以说刘少奇的立场相对接近于“统制派”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立场。这也正是文革前他和毛泽东之间产生严重对立的一个背景。

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党也开始努力将农民大众寻求“救助”的情念转向毛泽东,意图使毛成为全体民众的崇拜对象。比如颂扬“大救星”毛泽东的歌曲《东方红》就出现于当时。《东方红》的曲子原本出自1937年左右创立于延安附近的陕北民歌《骑白马》。这首民歌的诞生有如下背景: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导致日中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再次握手言和,中共的军队“红军”被编入国民党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位于陕北地区的部队成了“八路军”。而《骑白马》正是歌咏参加八路军的农民士兵的,⁴⁶其歌词是:

骑白马, 挎洋枪,
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
有心回家看姑娘, 呼儿嘿哟,
打日本就顾不上。……

歌词自然流露出普通民众的非政治性的浓郁感情，虽然其中出现了“八路军”的字眼，但并没有毛泽东和共产党。1943年冬，陕北葭县（现佳县）的农民歌手李有源依照原来的曲调，将其歌词改编为“移民歌”，加入了赞美毛泽东和党的内容，而后来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文艺工作队又将其改写成完全颂扬毛的《东方红》，并于1944年5月24日发表在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上，其歌词唱道：

东方红，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从上述脉络可以看出，虽然将毛泽东塑造成克理斯玛的并不是农民，而是党的上层官僚组织，但前提条件是民众具有寻求救助和进行抗战的情念，而共产党领导的村落重建运动迎合了这一愿望。如果缺少这一前提条件，毛泽东将难以成为超级克理斯玛。

我们从日本昭和5年（1930年）前后开始的通向“情念国家”的历程可以看出类似特征。当时频频出现的“左翼的转向”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例如，正像吉本隆明指出的那样，日共最高领导人左野学和锅岛贞亲的转变，就与日共接受共产国际的指令而提出“打倒天皇制”密切相关。当时正处于日本民众对天皇的崇拜趋于亢奋的时期，在此背景下呼吁推翻天皇制，必然使其脱离民众的“情念”而孤立，这对作为无产阶级和民众的政党的日共来说是致命的。⁴⁷

正如战前的“讲座派”和“劳农派”关于日本资本主义问题的论战所代表的那样，当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带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的局限，他们在分析天皇制问题时，主要关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经济基础，力图以此来解析社会结构的特征。依据这种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然发现不了作为天皇制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构成了日本民众的国家情念源泉的农本法西斯主义。到1932至1933年，左野和锅岛等人就被正在迈向天皇崇拜的民众降服了。当然，左野和锅岛等人也带有等

身大的日常性。就此而言，当他们在狱中意识到这一事实的时候，就只能脱离此前将民众仅仅看作政治动员对象的先锋队意识，而出现政治上的“转向”。

1930年代日本社会向天皇崇拜的迈进，是在日本农村陷入长期疲惫的危机状态下进行的，当时的世界经济恐慌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暴跌，史无前例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大面积的饥荒。在这种危机状况中，寻求救助的农民大众的情念转向以太阳和农业神（天照大神）为皇祖的天皇并不奇怪。结果克理斯玛天皇的神圣性急剧升温，被绝对神化。

在于危机状况中寻求救助这一点上，昭和初期的日本农民和40年代初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并没有什么不同。问题在于，原本生活在非政治世界的常民们渴望被拯救的情念，必然会被纳入政治世界而形成“情念国家”吗？

要确认的是，正是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危机状况消失之后，党的官僚组织才开始着手树立毛泽东的权威，对农民大众的情念进行诱导，使其转向以毛泽东崇拜为主线的国家宗教化，这种诱导和转变本身并不是农民大众自发要求的。同样，就日本的农民和农村来说，经过昭和大饥荒之后，到了1938年左右，虽然危机仍在持续，但已经脱离了大量饿死人的严峻局面。不过，当时农民希望得到天照大神的皇孙——现人神天皇“拯救”的愿望依然非常强烈。在此背景下，军政合一的官僚机构开始大张旗鼓地诱导民众转向克理斯玛政治，重要的举措有“国家总动员法”的颁布（1938年）、“大政翼赞体制”的确立（1939年），以及“战阵训”的发布（1949年）等等。总之，在上层的主导下，通过组织化和国家宗教化，民众的出于救助愿望的情念被导向了对天皇的绝对崇拜。

日中两国的国家宗教化过程存在着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在使农民、渔民的生产和生活依然依附于土地或大海，他们的实在空间依然密切附着于共同体世界的情况下，让他们的空间意识游离出等身大的生活世界，“升华”到抽象化和观念化了的政治世界，从而使其具体的日常生活与观念性的空间意识之间出现扭曲。正是出于这一目的，通过邻

里组织、互助组、居委会等基层熟人社会（草根）有组织地推进情念国家化。反过来看，基层熟人社会本身是由“乡规民约”等乡村内生的互助互惠规范支撑的等身大的世界，其间“互相监视”体制与互助互惠规范是表里一体、密不可分的，表现为一种悖论。从这一意义上说，情念国家化就成了一种扎根于基层社会的“有根民族主义”。

从结果来看，“有根民族主义”一方面由民众自发的克理斯玛崇拜维系，同时也导致了以民众的相互熟悉为基础的“互相监视”的社会规范。⁴⁸这与奥维尔以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为原型的小说《1984年》中描绘的社会不同，那里是一个“瞭望监视社会”：人们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全都被窃听器 and 探头所察知。这种社会只有在高度信息化的现代化背景下才会出现，生命循环的时间周期在那里受到制约，从事农林渔业的常民共同体已经衰退，使互相监视成为可能的熟人社会已经解体或消亡。在战争时期的日本，由于明治以来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已带有许多欧美式的“现代化”要素，来自中央政府的监视装置（如“特高科”）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农林渔业仍然在产业结构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仍然是以民众之间的“相互监视”为主。由此看来，战争时期的日本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都带有浓厚的非欧美的“亚细亚”社会的特征。

[VIII]

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 “扭曲”和“时间的龙卷”

在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时期，中国的农民和农村并没有遭遇战乱或自然灾害带来的生存危机。对村庄和生活构成威胁的敌人销声匿迹了，自然也就不存在对于外来侵略者的抵抗。尽管如此，自朝鲜战争以后，美帝国主义的威胁被不断地加以强调。但是“美帝国主义”对于普通农民来说是肉眼和所有感官都无法把握的存在。这与陕甘宁边区的农民在1943年摆脱了危机之后依然能够感受到日军和

国民党军的存在很不相同。能否直接用肉眼等感官把握到外部敌人，意味着农民的空间意识是停留在等身大的生活世界，还是游离而出，也即涉及到“常民意识”的问题。

尽管存在着这种变化，在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限制民众在空间上的自由流动，包括对旅行也施加了严格约束，户口的转移事实上不再可能，因此农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被严格束缚于土地的状态。⁴⁹这与1940年代前期形成了鲜明对照，当时处于战乱和饥荒中的农民还拥有选择最后的生存手段的自由，也即离开村庄而成为一个流浪者。因此，从结果来看，与陕甘宁边区时代的根据地政权相比，到1958年，中国农民的实在空间和实际生活与抽象化了的空间意识世界之间的扭曲程度更加严重了，“情念国家”演进到了更高阶段。

即便毛泽东的中国有意强化这种“扭曲”，为什么严厉限制农民的空间移动，并将其紧紧束缚于土地的问题仍然是必须追问的。实际上，竹内好认为毛的中国将战争期间的根据地革命扩大到全国范围，从而增强了对于毛泽东的幻想，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在竹内看来，这种做法将催生一种新的非欧美型的民族主义，从而与建立在民族国家“国民意识”基础上的欧美式民族主义的扩张有着根本差异。

的确，异常狂热地加入人民公社的中国农民，对于具有一定国家归属意识的民族主义的出现具有某种推动作用。但正是这一点存在着应该注意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时期，新岛淳良和山田庆儿曾把这种建立在根据地全面普及基础上的国家称为“共同体国家”，但是，“共同体国家”所设想的终极世界是消灭了国家本身的共产主义世界。⁵⁰也就是说，共同体国家只是通向理想世界的过渡期的国家。在过渡时期，借助于村落社会以熟人关系为基础的传统互助互惠规范，村庄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经过再组织化的改造更加符合“共同体=根据地”的本质要求，⁵¹与此同时，以人民公社为指向的村落再组织化，将行政空间由原来数百人的自然村骤然扩大